

袁庭栋 著

古人称谓

四川教育出版社

古人称谓

袁庭栋 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



(川)新登字005号

责任编辑：熊光
特约编辑：金波
版面设计：杨智
封面设计：金阳

古人称谓

袁庭栋 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教育出版社发行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7 插页 5 字数 390 千

1994年6月第一版

1994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500 册

ISBN 7—5408—2003—9/G·1922

定 价： 16.50元

前 言

古往今来，几千年历史的主体是人类的活动，世界文明的创造者是人，是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们要回顾几千年的兴废荣辱，总结各个社会侧面、各种文化创造的得失是非，所接触的、所研究的、所喜恶的、所怀念的，就是一个一个的人和他们的活动。所以我们在学习与研究古代文化时，就得时时处处与一个一个的古人打交道。逝去的古人我们无从得见，在我们脑海中所存在的，基本上是在文献材料中所见到的若干个不可得见的人物的名字以及可以起到名字作用的若干称呼，即古人的称谓。这在古代，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与家庭内相互交往的一种标识；在今天，则是了解任何一个古人的开端。也就是说，无论我们学习或研究有关过去的任何学科、任何问题，都必须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人，而每一个人又有着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称呼，这就会给我们的学习与研究带来若干麻烦。所以，要学习与研究古代文化，就必须学习了解关于古人的各种称谓。

我们说“每一个人有着各种各样的不同称呼”，十分复杂，十分麻烦，这绝非夸大其辞，而确是事实。关于这一点，早就有人为此叫苦不迭了。如宋人黄彻在《碧溪诗话》中就谈《左传》时深感人名变化之繁杂而有这样的感慨：“千变万

状，有一人称目至数次异者：族氏、名字、爵邑、号谥，皆密布其中”。其实，一个人有多种称呼，不仅古人如此，就是今人亦同样是如此，只是平时都不大注意就是了。为了让大家对于是所谓的复杂有一个比较形象的认识，我们先举今人为例。例如，眼前有位女性教师，虽然在户口登记簿上，只有一个“姓名”，可是小时有“乳名”，发表文章可能有“笔名”；学生叫她“老师”、“先生”；按职称，又叫她“教授”；按行政职务，又叫她“副校长”；按党内任职，又叫她“副书记”；如果校内有几个兼职，还会有“工会主席”、“学报主编”，以及各种“委员”；如果参加了几个学术组织，又少不了几个“副会长”、“理事”、“秘书长”；如果出席人大，又会有“代表”、“常委”等名义；如果组团出访，又会是“副团长”；如果有家室，丈夫称她为“妻子”，为“爱人”，为“老伴”；孩子称她为“妈妈”，为“母亲”；父母可能仍叫她“小毛”、“三妞”、“老三”；各位亲属则可能叫她“姐”、“妹”、“姨”、“孃”、“婶”、“姑妈”、“舅母”、“嫂子”、“侄媳妇”、“表嫂”、“表孃”、“岳母”、“婆婆”、“奶奶”、“舅婆”等；旁人会叫她“小姐”、“女士”、“夫人”、“太太”、“大嫂”、“大婶”、“大娘”、“老太婆”；还有今天无往而不用了的“同志”、“师傅”；如果老同学见面，还会叫她当年的绰号如“肉蛋”、“皇后”之类；如果是被怨骂，还可以被叫做“冰块”、“母老虎”之类。当然，还可以举出许多。一句话，对每一个人的称呼都会是各种各样，花样百出的。只不过，今天这些称呼，大家都懂（或虽然说不清楚，但不会误解），无须研究，不用翻辞典。但是到了千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在这些花样百出而且不断翻新的称呼面前，必然会发出种种疑问，必然会有人去作

一番清理与考证，写出几本诸如《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称谓研究》，编出几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称谓辞典》之类的书来。这里我可以为他们预先推荐以下一些研究题目，如：《“师傅”一词衍变之过程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历史》、《“同志”考》、《“委员”初探》、《论“爱人”一词何以成为不分性别、无论婚否、囊括老中青、覆盖中国四分之三人口之通称》、《试论“小组长”职能不小》、《关于“书记”一词之产生及其流变的历史考察》、《各种“主席”称呼的分类研究》、《“小皇帝”辨》、《关于某某一生中所用称呼综考》、《某甲与某乙乃一人之异称考》、……我相信，千年以后的学者，若能将这些问题搞清楚，准可以得到博士学位。

话说回来，我们今天对古人的种种称呼，也不正是有的清楚，有的不清楚，有的还正在研究、考证、争论之中吗？且不说古人，就是对辞世不久，大家相当熟悉的鲁迅、瞿秋白、王仲叔等人，他们一生中到底用过哪些笔名与化名，不是至今还在继续研究之中吗？所以，关于古人称谓问题，是我们任何一个学习与研究中国文化问题的人都应当十分重视的问题，可以认为是一种基础知识，是基本功。前辈学者称目录、年代、职官、地理等基础知识为学习古代文化入门的钥匙。其实，称谓也是这类基础知识之一。

为什么必须如此重视关于古人称谓的各种知识呢？这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古人的称谓太复杂，远较今天复杂。我们现在从文献材料中所见到的绝大多数古代人物的称呼都不止一个，而是几个，甚至几十个，大体上因为不同人物经历的繁简、社会关系的广狭、文化程度的高低的各种差异而有所不同。我们可以随便举出几个大家所熟悉的人物为例：

周代的姜尚，又叫吕尚、姜牙、姜子牙、姜太公、太公

望、吕渭；

晋代的大诗人陶潜，又叫陶渊明、陶元亮、陶彭泽、靖节征士、五柳先生；

唐代的大诗人杜甫，又叫杜子美、杜陵、杜少陵、少陵野老、杜拾遗、杜二拾遗、杜工部、老杜；

宋代的大政治家王安石，又叫王介甫、王临川、王荆公、王文公；

明代大哲学家王阳明，又叫王守仁、王伯安、王余姚、王新伯、王文成。

这些还算是最常见的。我们再举一个不太常见的例子：如被称为最能相马的伯乐，据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七的考证，实际上是二人同名，即有秦之伯乐，有赵之伯乐，不明者往往误解。就以赵之伯乐而论，在先秦不同的文献中就有伯乐、王良、邮良、孙明、孙阳、邮无邮、邮无正、孙无政、王子期、王子于期，是一人十名。

有些古人虽然人们都很熟悉，但是其众多的各种称呼，却不是人人都知道的。例如苏轼，可谓尽人皆知，他一生中使用过多少称呼呢？据有几位学者的研究，他的称呼有好几十个：苏轼、苏子瞻、苏子平、苏和仲、苏同文、大苏、苏二、大苏公、苏长公、眉山公、苏眉州、峨眉先生、苏贤良、苏太史、苏使君、东坡居士、苏东坡、雪堂、苏副使、狂副使、老农夫、雪浪翁、长帽翁、苏尚书、苏礼部、苏学士、苏翰林、苏内翰、苏端明、苏徐州、苏惠州、大坡、老坡、谪仙人、东坡翁、坡翁、东坡道人、坡仙、坡公、东坡老人、东坡病叟、坡老、苏公、苏仙、苏子、西湖长、秃髻翁、白发兄、香案吏、玉堂仙、老泉山人、铁冠道人、思无邪斋、笠履翁、苏玉局、玉局翁、德有邻室、毗陵先生、髯苏、髯公、髯翁、文星、奎

宿、妙喜老人、苏文忠公、苏文忠。……

以上，是同一位古人有着好几十个不同的称呼的例子。这些众多的称呼很可能使我们产生误解，张冠李戴，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的麻烦是，古人有很多普遍使用的称呼，在古代文献中很常见，可是今天均已不用，这些众多的称呼各自是何含义？相互间如何区别？今天也是不容易搞清楚，而且很容易引起误解或混淆的。我们仅以称“人”者为例，古代就有：宜人、才人、贵人、夫人、孺人、硕人、淑人、令人、恭人、山人、道人、散人、闲人、野人、舍人、寡人、余一人、鄙人，……这其中，多数今天已经不用，如果不学习这方面的知识，真不知会生出几多误解和混淆。

为什么古人会有如此繁复的称呼？这主要是因为：

一、古人在自己对自己的称呼，即所谓“自称”方面，有较多的讲究，小时有名、有小名，成年有字，读书人一般都有别号、有室名（即书斋名）。而且，字、号、室名有时还不止一个。

二、古人讲礼，对别人用尊称，对自己用谦称。仅在对对方的尊称中，除了可以在不同人之间通用的若干尊称之外，还因为对方所任官职、所封爵位、出生或任官地点、学识高低、与自己的关系等等不同，而从不同侧面去尊称对方。

三、古代社会等级森严，不同人有不同的称呼，特别是统治阶级中的人物，往往有若干种特有的表示其身份等级的称呼，有若干本可直截了当却偏要绕弯倒拐的代称。

以上三方面所提到的各种情况，下文中都要加以讨论并举出大量的例子，故这里不再举例。正因为有这些情况，就使我们在阅读古文献，了解古人身世时，会出现种种困难。对于平时未学过这方面知识的青年同志来讲，可能遇到的困难就更

多。下面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

于慎行《谷山笔麈》卷十三《称谓》载：北齐时“宫中呼嫡母为家家，乳母为姊姊，呼妇为妹妹”；唐末，“宫中称天子为宅家，亦称大家，亦称官家，唐初称天家”；“西汉臣子称朝廷为县官，东汉称天子为国家，北朝称家家，唐称圣人，亦称大家、天家，宋称官家，辽金称郎主”；“唐时宰相呼曰堂老，两省曰阁老，尚书曰院长，御史曰端公”；“金之官长皆称勃极烈，元之官长皆称达鲁花赤”。于慎行是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人，他对上述称谓已感到颇为特别，故搜集而为当时的读书人列述之。我们生活在于慎行400年后，而且又经过了社会大变革，对这些当然更会感到陌生。

不久前的“文革”大乱之初，北京出了一桩著名的“称谓大案”。有一些青年人在北京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发现一枚陈列着的印章，上面刻着“前身弥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他们十分惊异，立即上报。反革命两面派康生佯装不知此事（其实他既知印章来历，也懂印章内容）定性为“反动印章”，砸碎印章，焚毁材料，对有关同志加以残酷迫害，并通告全国。其实，康生此举是既将铁拳砸向无辜群众，又将攻击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原来，这枚印章是周总理在1963年指示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并陈列出来的，目的是为了纪念印章的主人柳亚子先生。柳亚子先生是我国现代史上杰出的诗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是自辛亥革命起就在文化界长期奋斗的政治家与学者，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都有着深厚的友谊。抗日战争后期的1945年，他日渐认识到蒋介石政权没有讲民主的可能，也没有抗战到底的决心，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对当时共产国际的领袖斯大林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产生了极大的崇敬与期望。所以他在当时国民党政权的心脏重

庆，请著名篆刻家曹立庵为他刻了上述的印章。当时一次刻了两方印章，一方即为所陈列者，还有一方刻着“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在此之前柳亚子还刻了一方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前身陶彭泽，后事韦苏州。”这里的“大儿”、“小儿”并非詈骂之语，而是汉代称谓中的一种特殊用语，是对杰出男子的一种尊称。《后汉书·弥衡传》载，东汉末年，“弥衡字正平，平原般（地名，在今山东）人也。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在品评这些贤士大夫时，弥衡一个个加以评论，都看不起，“唯善鲁国孔融及弘农杨修，常称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按：孔融字文举，杨修字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融亦深爱其才。衡始弱冠（即成年，弥衡时年24岁）而融年四十，遂与为交友，上书荐之。”这里讲得很清楚，比弥衡年长16岁的孔融被弥衡称为“大儿”，十分高兴，遂与之交友，还大力向曹操推荐这位年青有为的人才。当时，“大儿”、“小儿”有如今言“丈夫”、“好男儿”、“好儿郎”，是夸奖，是尊称，故而邓艾称姜维为“雄儿”，桓温称王敦为“可儿”。仅以后也有仿之者，如苏轼在《书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一诗中就有“大儿汾阳中令君，小儿天台贺季真”之句。在柳亚子的另一方印中的“兄事”、“弟畜”也是古人用语，见《史记·季布传》：“长事袁丝，弟畜灌夫。”柳亚子所以用“大儿”、“小儿”来尊称斯大林与毛泽东，很可能是受了生长于重庆的辛亥革命前著名青年英雄、自称“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的影响。因为邹容在著名的《革命军》一书第一章就有“大儿华盛顿”、“小儿拿破仑”之语。如果不懂这种古人的较为特殊的称呼，就会造成极大的误解。此外，柳亚子印章上的“陶彭泽”、“韦苏州”也涉及到古人称谓中的

“官称”问题（见下文）。诸如这类决不能以现代白话去理解古人称谓的例子，我们在本书中还可以见到很多，此不多说，只举一个与“儿”相对的称呼：“老子”。

今天经常听到有人自称“老子”，都是在各种不礼貌的场合中、不严肃的语言中，乃至吵架时使用的，是胡传奎式人物的自称，可在古代却与此不同。我所见到古人称老子的，如下各例：《后汉书·马援传》：“颇哀老子，使得遨游。”这是马援在处理公务时的自称。《后汉书·韩康传》：“此自老子与之，亭长何罪！”这是韩康与汉桓帝派来的使者对话时的自称。《三国志·吴书·甘宁传》注引《江表传》载，孙权说：“足以惊骇老子否？”这是称曹操为老子。《晋书·庾亮传》：“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这是庾亮与诸佐吏对话时的自称；而陶侃在同庾亮谈话时也说：“君侯修石头（指石头城）以拟老子，今日反求见耶！”《晋书·陶侃传》载，陶侃还对王愨期说过：“老子婆婆，正坐诸君辈。”这都是陶侃的自称。《晋书·应詹传》载，刘弘对应詹说：“君器识弘深，后当代老子于荆南矣。”这是刘弘的自称。《华阳国志·大同志》载李雄与李离之言曰：“与君计虽定，老子不从，奈何？”这是他称，是称呼李雄的叔父李流与姑父李含。《资治通鉴·后梁均王贞明四年》载唐庄宗李存勖亦自称“老子”。而在《旧五代史·唐庄宗纪二》中，他又称大将李存审为“老子”。辛弃疾在《沁园春·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一词中，有“老子今朝，点检形骸”之句，是慷慨陈辞时的自称。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卷一中载：“予在南郑，见西陲俚俗谓父曰老子，虽年十七八，有子亦称老子。乃悟西人所谓大范老子、小范老子（按，此指北宋时，羌人与西夏人曾称范雍为大范老子、范仲淹为小范老子），盖尊之以为父也。”这是尊敬的他

称。陆游又有《夜泊水村》诗，其中有“老子犹堪绝大漠，诸君何至泣新亭”之句，是在自称老子。《老学庵笔记》卷二载，黄庭坚有“老子江南江北，爱听临风笛”之句，也是自称。宋末名将余玠开府重庆时，曾在招贤馆客舍门前书一对联：“老子亦常来伺候，诸公聊复忍斯须。”（见曲滢生辑《宋代楹联辑要》）这是很客气的自称。由以上事例可知，古人用“老子”是很普遍的，自称有如“老夫”，他称有如“老丈”，毫无不严肃的意味，与今天“老子的队伍才开张”、“老子天下第一”、“老子宰了你”之类的“老子”，其用法有很大差别。余嘉锡先生在《世说新语笺疏·容止》中认为：“汉晋人之自称老子，犹老夫也，有自谦之意焉。”是正确的。当然，今天的用法也是从古代的用法发展演变而来。唐代敦煌写本伯2643号卷子《古文尚书》残卷，卷末有这样的题记：“乾元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义学生王老子写了，故记之也。”这显然是抄书匠的牢骚，颇与今天用法相似。《新五代史·冯道传》载耶律德光与冯道的对话：“德光诘之曰：‘尔是何等老子？’对曰：‘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这也是很明显的讥诮之语，很不庄重，与汉晋之风大不相同，而与今天相近了。

关于称谓随时代不同而变化，早在宋代就已有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如《宋史·兵志九》载熙宁八年宋神宗诏令，称唐代之“官号物名，与今称谓不同，武人将佐多不能通其意”。遗憾的是古人未在这方面多作一些记录整理、疏证说明的工作，以至我们今天无法从古人著作中找到这方面的较为系统的论述，给学习古代文化带来不少困难。由于我的浅学，我所知古人关于这方面的较系统的著作只有两种，一是北周卢辩的《称谓》五卷，早佚，只存目于《隋书·经籍志三》。二是清代中叶梁章钜的《称谓录》，这是我们所能见到的唯一一种古

代学者专门集古人称谓的著作。此书记载了较多的古代称谓，但重点在“录”，录的重点又放在职官名号和亲属称谓，基本上未作论说与溯源，故而只能视为一部虽然编排不太恰当、不够全面，但在某些方面材料还是较为丰富的资料汇编。此外，如钱大昕《恒言录》、翟灏《通俗编》中，也蒐集了一些有关称谓的材料。

由于古代缺乏这方面的有关著作，所以一些学者在整理重要古籍时，为了让读者对于该书中每个人物的各种称呼不至误会，不得不将该书中每个人物的各种称呼进行清理，作为整理注释工作的一部分，附于该书之中。例如：我国最著名的古代文史要籍之一的《左传》，其中的称谓就十分复杂。清代大学问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繁称》中就说过：“尝读《左氏春秋》，而苦其书人名字，不为成法也。……随意杂举而无义例，且名字、谥行以外，更及官爵、封邑，一篇文中，错出互见，苟非注释相传，有受授至今，不复识为何如人。”所以，晋代杜预在为《春秋左氏传》作注时就特地编了《春秋名号归一图》，将“经传有异呼者合而录之”，置于他的《春秋经传集解》之前。此外，如《世说新语》的旧刻本多附有《释名》，中华书局近年所整理出版的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专门由张忱石编了《世说新语常见人名异称表》附于书后。胡道静先生作《梦溪笔谈校证》，也特地作了《释名》置于书前，以便使读者能从此知道“《笔谈》所称人名，或用别字，或用封国，又有用谥号者”的种种不同称呼。以上这类工作，其实正是在解决某一部古代典籍中的称谓问题。

遗憾的是，在近代学术界的汗牛充栋的研究著作中，至今也还没有一部著作是专门研究古人称谓的（只有几种研究姓氏学的），连有关的论文也很少。据我所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以来第一次在书籍中将古人称谓问题予以重视，并向广大的古代文化的学习者专门介绍古人称谓知识的，是1963年初版的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该书的《古汉语通论》中，有《古代文化常识》部分，其中有《姓名》一节。虽然只有短短的不到10页文字，但向读者简明地介绍了古人的姓、氏、名、字、尊称、卑称、别号、谥号、庙号、尊号、避讳的最基本的知识。当时，我还在四川大学历史系作研究生，正是读了这部《古代汉语》之后，才认识到“古代文化常识”对我们的学习与研究工作是如何的重要，并从那时开始，长期注意这方面知识的积累，以作为自己读书治学的一项基本功，今天才可能回到母校为研究生讲授《中国古代文化史》这门课，并写出了一些有关的书籍和文章。我这本不成熟的拓荒之作，正是在《古代汉语》一书的启发之下写成的。

我早就有心写出这样一本书来，暂时填补空白，以便抛砖引玉。可是，由于我毕业离校以后，一直未搞专业，只能业余读书治学，故而资料收集工作进展缓慢。直到1981年，《历史知识》杂志创刊，主持该刊工作的李有明同志要我为杂志写一组连载文章。我先是想写科举制度，但因有其他朋友表示要写，于是我就利用多年来点滴积累的若干资料，改写古人称谓。这样，十几篇《古人称谓漫谈》就陆续在该刊连载。虽然由于刊物是普及读物，每篇文章均短，讲得很粗浅，可仍受到好些读者来信的热情鼓励与赞扬，增强了我一定要将此书写成的信心。1985年，我的《中国古代战争》一书完成之后，就花了半年多的业余时间，专门读书，特别是翻了一百来种古代笔记，为增订已发表过的两组连载文章《古代职官漫话》（这一组文章陆续刊于《龙门阵》杂志）和《古人称谓漫谈》收集材料。1987年8月，《古代职官漫话》一书完成。从12月起，就

开始在原来连载文章的基础上写这本《古人称谓》。我希望此书能作为广大的学习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读者的一本简明实用的参考书，如同我在完成此书之前所写成的《古代职官漫话》一样，尽力做到既给大家较系统的有用的知识，又让此书有较强的可读性，不致令人感到枯燥、干涩，味同嚼蜡，满纸学究气。

有两个重要问题必须首先在这里交待清楚。

其一，有必要谈谈本书为何以《古人称谓》为名。

“称谓”一词，秦汉时未见使用，最早见于《晋书·孝武文李太后传》所载会稽王司马道子的书启：“虽幽显同谋，而称谓未尽，非所以仰述圣心，允答天人，宣崇正名号，详案旧典。”这里的“称谓”，就是对人的称呼，与后世的含义相同。在古代文献中，“称谓”与“称呼”无多大区别，是近义词。在指某一具体称呼时，多用“称呼”；在泛指多种称呼时，多用“称谓”。如孔颖达《礼记正义·典礼下》在“使者自称曰：寡君之老”下云：“此一节明诸侯及臣称谓之法。”前面已经提到，北周的卢辩曾写过《称谓》五卷，唐代刘知几在著名的《史通》中有《称谓》一篇，后人在一些笔记中也多以“称谓”为题，故而清代梁章钜编了《称谓录》一书。我现在用“称谓”一词，正是沿用古人习用之词。

为什么不能如“职官制度”那样称为“称谓制度”呢？因为就少部分称谓而言，古代确实有制度规定；但就各种称谓总的来看，是没有制度可言，而是约定俗成的，如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所言：“历观自古称谓不同，缘情而作，本无定准。”（《史通》卷四《称谓》）就是说，有一定规矩可循，却无制度明文可依。正如今天的称谓一样，何谓“舅父”，何谓“师傅”，确有一定之规，人人都懂，但却找不到任何制度条

文。新中国建立以来，“爱人”一词逐渐成为“丈夫”、“妻子”两个词的代称，成为既表示配偶关系却又不分性别的极不确切的称呼，可是却约定俗成，甚至成为若干有权威性的表格和法律文书中的正式用语。哪里能找到一条给予规定性或界定性的制度条文呢？找不到，可就是这样稀里糊涂地用了多年，还在继续使用。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所以我未用“称谓制度”这一概念。

其二，有必要谈谈本书的体例问题。

也正是由于古人称谓无制度规定，无专书可查，无框架可依，所以我在撰写此书时就不可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形成一个为大家所熟悉的有机的系统，只能按我多年来读书所见到的若干关于古人称谓的材料，分类排比，进行讨论。故而全书显得内部联系不足，熔铸功夫不足，这实在是从实际材料出发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我的本职工作是编辑，已在出版社工作了20年。多年来，我和很多同志一样，习惯于将各种书籍大致分为三类：学术专著、知识读物、普及读物。这本《古人称谓》算哪一类？我有意使之介于学术专著与知识读物之间，既要使之具有空白白的学术专著的科学性，要有自己的见解，要有分析、有论证，乃至有必要的考证；可又要使之尽可能具有可读性、实用性，尽可能少作考证，文字尽可能流畅、简明，尽力避免枯燥、烦琐的弊病。之所以要作这样的努力，目的很明白，就是想尽可能使此书多几个读者，扩大此书的社会效益，不至于使学术著作的读者日益减少，甚至搞得无法征订。我很希望此书不仅能被从事古代文化研究的同行们所参考，又能被大学生们、中小学教师、有中等文化程度而又在继续学习的广大的自学朋友们所接受、所喜爱。如果此书能为大家介绍较丰富的

有关古人称谓的知识，又能在更优秀的有关著作问世之前暂时起到一定的可供查询参考的手册作用，我的研究与撰述就算达到预期的目的了。在1985年以前，我已写过五本书，或是学术专著，或是知识读物，或是普及读物，分得一清二楚。可1985年以后，我在编辑工作中和在业余的研究、撰述中，却有了变化，一直在提倡并力行多搞几种具有学术水平的可读性较强的史学著作的设想（当然，并非所有学术著作均应如此，不能一刀切）。在此书之前，我所写的《中国古代战争》、《古代职官漫话》两书都在作这种努力，至于效果如何，还有待读者的评说。

最后，还有必要事先在此自我献丑，谈谈此书的最大缺陷或短处：不全面。

我写此书，为了不使篇幅过大，是有一个范围的，就是除了学习古代文化时接触得十分频繁的古帝王之外，都以古人通用的称谓为限，希望将古人通用的重要的称谓都包括在内。至于各行各业专用的、官场科举场中专用的、军旅中专用的、释道专用的等等，暂不包括在内。“古人”的范围比较宽泛，近代文化中的内容，只要在“五四”之前，均包括在内。凡较重要的称谓，都尽可能作溯源的研究，指出最早开始使用的时期。所以举例时，也多举早期、前期的例句，因为除了已经指出的后世不用的称谓之外，举出了早期的例子，后世当然是自不待言了。

以上是我的主观设想，可我知道，这个设想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因为在关于古代文化的研究中，大多数研究课题都是有一个大致的资料范围的。以我自己业余自学的经历而论，我写过《张献忠传记》，可以说，有关张献忠的主要资料，我大部分都已掌握了。我写过《殷墟卜辞研究——科技篇》，写过